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启示

王小强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论述东方社会形态时多次使用的一个概念。很长时间里，由于一系列复杂的历史原因，这个概念曾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政客攻击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武器。威特福格尔一类的反动学者借它诋毁、诬蔑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使这个学术概念蒙上浓郁的政治色彩，妨碍了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原意。事实上，澄清这个概念，不仅不会动摇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而且还能使我们得到对马克思主义更为准确的理解，得到些有益的启示。

一、“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个科学概念吗？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东方社会时，曾多次运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并对基于这种生产方式之上的社会结构，有过一系列细致的描述，甚至对这种生产方式发生的原因，也作过极有价值的探讨。但是，由于材料有限，他们的一些分析，往往是针对一些个别国家的具体形态而发的。很难说，他们在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上，也和他们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一样，形成了一个完整、严密的系统。笼而统之，马克思、恩格斯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描述，通常是从没有土地私有制开始的。恩格斯曾断言：“在整个东方，公社或国家是土地的所有者，在那里的语言中，甚至都没有地主这个名词。”^①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借用过“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②这句话。因为没有土地私有制，所以“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那末，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或者不如说，不会再有什么同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在这种情况下，依附关系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除了所有臣民对这个国家都有的臣属关系以外，不需要更严酷的形式。”^③其逻辑关系为：没有土地私有制，导致租税合一；同时，所有人臣属国家，也就没有西欧农奴制那般拘谨的人身或土地依附关系。当然，这是要以西方学者最关切的专制主义统治为代价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形成原因，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曾认为“主要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④马克思完全同意，并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转述了这个看法：“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⑤根据以上这一基本脉络，意大利的翁贝托·梅洛蒂教授，在他那本

①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56、260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5卷，第89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60页。

⑤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4页。

很有影响的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专著中，把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整理概括为以下三个基本特点：“第一，没有土地私有制，即使退一万步，至少，土地也是属于国家所有。第二，亚细亚社会的基础是村社制，每一个村社通过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而达到自给自足。第三，中央集权起着支配作用。这种权力是在历史过程中确立的，这是由于要使农业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需要而必须举办水利工程和其他公共工程的那种环境造成的结果。”^①

这些简单的概括，远不足以说明任何一个、甚至任何一个被人们通常看成是主要的“亚细亚社会”国家的状况。梅洛蒂教授曾着重论述了俄国、中国和印度，并且视中国为“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亚细亚’社会的最典型例子。”^②但是，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井田制就已经瓦解。商鞅变法，“坏井田，坠阡陌，民得买卖”，秦汉以降，“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的现象周期出现，土地兼并是几千年循环往复的封建社会不可治愈的绝症。封建社会前期，在部分授田制、均田制以及准军事的屯田制度下，是有租税合一的现象。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唐宋以后，“地主土地最低必要量”降低，^③地主经济成熟，国家不仅不能再弄什么“均田”，其“以丁户为本”的税收重心，也不得不“摊丁入亩”了。我国早在汉代，就有“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的记载，要说我国不知地主为何物，是绝对不可能的。俄国村社虽然一直保持到近代，但俄国并无引人注目的水利工程。十五世纪末，俄国作为许多分散的诸侯国，尚处于蒙古人的铁蹄之下。直到十六世纪末，即欧洲文艺复兴两个世纪后，伊凡四世才最终完成国家的统一，在世袭贵族领主的基础上，建立起野蛮的专制制度。俄国专制制度的建立，世界史学界素有“再版农奴制”的评价，这不仅与俄国社会自身的演进过程有关，而且已和西欧资本主义的崛起相联系。印度虽有水利和村社的记载，但种姓制度的遗毒至今未除，并且宗教纠纷此起彼伏，国家长期四分五裂，外族入侵和统治几乎从始至终，直到西方殖民主义者侵入之前，南印度尚未统一，以致马克思说：“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它的历史，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征服者的历史。”^④莫卧儿帝国最兴盛之时，君主也不过直接占有全国土地的三分之一左右，大部分土地仍不得不以军事采邑的形式分封贵族。^⑤简而言之，中国有土地私有制和地主；俄国无巨大的水利工程；印度没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梅氏的概括，虽然都涉及到这些国家的具体特征，但并不足以形成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完整认识。

对于不同社会的共同特征进行现象形态的描述、类比和概括，在科学上是允许的。但是，现象形态的分析，并不能与社会形态的本质规定直接等同。在没有作出准确概括的情况下，在概念的外延、内涵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先入为主地说我国或俄国或印度是“亚细亚社会”，是不完整、不科学的。

二、“亚细亚生产方式”提出的角度

“亚细亚生产方式”不仅不是一个系统的科学概念，甚至也谈不上是一个准确的地理概

^① 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3页。

^② 同上，第105页。

^③ 参见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82页。

^④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9页。

^⑤ 见朱寰：《世界通史》中古部分1979年版，第490页。

念。马克思、恩格斯都曾多次在“东方”、“亚洲”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从他们提到的那个沙漠地带看，主要应包括北非的撒哈拉沙漠，阿拉伯半岛的内大得和鲁卜哈利沙漠，印度河流域的塔尔沙漠，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的卡来库姆和克齐尔库姆沙漠，以及我国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从历史上看，俄国和中国本部的文明发展，均与这个沙漠地带关系不大。印度河在今巴基斯坦境内，经东印度公司为马克思、恩格斯提供大量“亚细亚生产方式”材料的印度，按独立后的版图看，也仅仅在边境上与这个沙漠地带沾边。然而，马克思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提到的国家和地区，却有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阿拉伯、土耳其、鞑靼、俄国、中国、印度、爪哇、东印度群岛、阿兹台克时期的墨西哥、印加时期的秘鲁等等，^①当时文明信息所及的地域，除西欧部分外，几乎都与这个问题有关。

马克思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而且是一个极其严肃的学者。不能想像他是在用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待“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问题的。相反，从他的大量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对于这个研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亚里士多德伊始，凡与东方文化发生接触的西方学者，都不能不看到东、西方文化系统之间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反映在孟德斯鸠、黑格尔、亚当·斯密、詹姆斯·穆勒、马尔萨斯等一系列思想家的著作中。由于马克思透彻把握了西欧社会发展的历史，所以使他能与外部世界的有限接触中，更为敏感地发现种种深刻的不同。虽然不能说“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已经完成，但也不能不承认，马克思凭借独到的敏锐眼光，对东方世界作出的一系列真灼的判断，在今天也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彩，具有极深刻的现实意义。尽管马克思所涉及到的这些国家各不相同，尽管马克思在分析这些国家的特征时有过不同的表述，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抓住了这些不同国家的共同点，即：它们都与西欧不同。可以说，“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就是从这个角度提出并使用的。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与泛斯拉夫主义的斗争中开始使用“亚细亚”的概念和大量研究东方材料之后，曾几次坚决反对把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分析看成是一切民族的必由之路。马克思说：“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②很显然，在他看到横贯五大洲诸多国家历史发展与西欧的明显不同之后，这决不是一般的谦虚。马克思的这种态度，实际上，始终是和他从什么角度提出以及在什么意义上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紧密相关的。

从历史上看，在这个广阔领域中的许多国家的历史发展，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没有经过希腊、罗马那样高度发达的典型奴隶制阶段，北非、两河流域和小亚细亚的一些国家，即使曾一度被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亦是如此。而奴隶制对欧洲历史来说，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恩格斯说过：“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同样又为人所必需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

^① 参见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第88页。

^② 马克思：《致“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

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①然而，历史常识告诉我们，典型奴隶制，甚至并未在西欧普及。其发生范围，在当时有人类活动的领域里，不过是弹丸之地。如果那时就有世界史学家，完全有理由说“亚细亚”是人类发展之正宗，而把希腊、罗马当成特殊的变例来处理。饶有兴味的是，西方学者萨维尔今天就持有这种认识。在他的社会演进方框图中，“亚细亚的”、“斯拉夫的”、“日耳曼的”都有资格发展到社会主义，唯独“罗马人的”“不发展而自灭”。^②欧洲历史的进一步发展、起源于蛮族对罗马帝国的入侵。当然，我们不能作出没有民族大迁徙就没有欧洲的农奴制这样的假设，同样也不能认为没有阿拉伯骑兵在欧亚大陆的驰骋，就不会有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但是，从不同国家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人类历史的发展，决不是只有西欧的一种模式。

世界历史的发展，是“多线”还是“单线”，这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是十分清楚的问题。恩格斯在论及国家和阶级形成的问题时，曾细致入微地描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③，也明确证明了这一点。

三、“亚细亚生产方式”提出的意义

“亚细亚生产方式”提出的意义在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承认，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各地区、各民族、各国家在同时走着相互差异的不同道路；对于某个或某些个别地区、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分析，不能直接等于一般历史哲学，用以解释和指导一切民族的发展。这一科学认识，对于落后国家、特别是东方国家，有着更为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在我国的历史研究中，关于历史分期、土地所有权、资本主义萌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等问题，始终进行着经久不衰的热烈讨论。历史分期问题，即有西周、春秋战国、两汉、魏晋等多种划分；土地所有制亦有国有、私有及三种所有制并存等诸家学派；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从明清直至战国时期。这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观点，都不可回避地正视了中国与西欧历史的巨大差异；都在自己的研究中，为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道路提供了大量论据。

更具有戏剧性同时对我国民族经济发展也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东方国家近、现代的历史。

资本主义文明，能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使生产力的发展超过人类几万年历史发展的总和。它早期蓬勃的生命力，具有打破国界、冲垮民族界限的巨大能量。发轫于西欧的资本主义，作为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带头文明”，具有比古罗马或中世纪文明更强大千百倍的力量，在近、现代不同民族文明的交互作用中，处于强大的输出地位，并对其他民族文明的发展，起到不容抗拒的决定性历史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用了大量篇幅来描述这个历史过程，并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④

然而，我们决不可以据此而对经典作家的论述（包括经典作家在其它场合诸如此类的论

①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0页。

② 参见《世界历史》1981年第3期。

③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8—220页。

④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255页。

述)采取教条主义的理解,相反,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资本主义历史作用的充分肯定与“亚细亚生产方式,提出的角度和意义统一起来考虑”才能得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把握。毫无疑问,西欧资本主义向落后国家输出了先进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文化,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恰恰由于这种输出以殖民主义的形式、以一种取代落后国家自己历史发展的姿态出现,才在东方国家创造了一场离奇的历史悲剧,而且“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①马克思、恩格斯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种历史悲剧的二重性。

印度,是较早也较彻底被西方文明所征服的东方古国之一。在那里,西方资本主义的输出,带来了一系列进步的因素:“使印度达到比从前在大莫卧儿统治下更加牢固和占地更广的政治统一,是使印度复兴的首要前提。英国人用宝剑实现的这种统一,现在将被电报巩固起来,永远地存在下去。不列颠的教练班长组织训练出来的印度人军队,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 and 不再一遇到侵略者就被征服的*Sine qua non*〔必需条件〕。在亚洲社会里第一次实行并且主要由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共同子孙所领导的自由报刊,是改建这个社会的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虽然十分可恶,但却是亚洲社会迫切需要的那种土地占有制即私人土地占有制的两种不同形式。从那些在英国人监督下在加尔各答勉强受到一些很不充分的教育的土著居民中间,正在成长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接触了欧洲科学的新的阶层。蒸汽使印度能够同欧洲经常地、迅速地来往,把印度的主要海港同东南海洋上的港口联系起来,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状态,而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突出的一切,从而消灭了印度的文明。”^②“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不列颠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③“象东印度居民的所有的贫苦阶级所受的那种苦难,恐怕在全部贸易史上都很难找到第二个例子。”印度织工的苦难情景给我们留下了可怕的印象。“这种灾难在商业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织布工人的尸骨把印度的平原漂白了。”^④“柴旺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再加上盐税,同印度的气候结合到一起,就为霍乱这种毁灭性的灾难的流行造成了适宜的环境,这种灾难正在由印度向西方世界猛扑。这真是人类的灾难和罪恶互相影响的惊人的可怕的事列!”^⑤“他们听任灌溉渠道和水闸毁坏”,^⑥结果经常发生饥荒。1866年孟加拉省奥里萨地区一次饥荒就饿死了一百多万人。^⑦由于“完全忽略了公共工程部门,因此,不能按照不列颠的自由竞争原则——听之任之的原则——来发展的农业便衰落下来了。”一方面,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另一方面,英国的入侵给印度带来了饥饿、匮乏和疾病。并且“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式的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式的专制,这两种专制结合起来要比萨尔赛达庙里的狰狞的神像更为可怕。”^⑧

①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页。

②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1页。

③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4、145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72页。

⑤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45页。

⑥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5页。

⑦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注6。

⑧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5、67、68页。

同样的悲剧,紧接着就在更古老更顽强的中国重演。“1840年,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内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然而,“这种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对中国工业也发生了过去对小亚细亚、波斯和印度的工业所发生的那种影响。中国的纺织业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危害,结果就使社会生活受到了相当的破坏。”^①“从1833年起,特别是1840年以来,由中国向印度输出的白银是这样多,以致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1840年以后,一方面,我国的民族工业开始发展,沿海地区区域性的专业化种植开始形成,农产品的商品率有了显著提高。^②另一方面,政府财政却越发拮据,富农经济逐年萎缩,^③自然灾害、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割地赔款,此起彼伏,连年不断。整个政府日趋腐败,国民经济每况愈下,人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卖儿鬻女,转死沟壑,处于水深火热的荼毒之中。近代中国,衣食无着的雇农有三千万人左右,土匪、游民、兵痞竟有两千万人之众。据外国学者估计,1927年,中国有900万人民死于饥馑,1928年3,700万,1929年3,700万人!^④不能否认,资本主义用大炮和鸦片为我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文化。同样,“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那就是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⑤

就是在相对先进并地处欧亚两洲的俄国,类似的历史悲剧,也同样在所难免。恩格斯在《论俄国社会问题》一文中曾有过一段形象的描述:“财政已经混乱到了极点。捐税的重压已在失去作用,旧国债的利息用新公债来偿付,而每一次新公债都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只有借口建造铁路还能得到一些钱!行政机构早已腐败透顶,官吏们主要靠贪污、受贿和敲诈来维持生活,而不是靠薪俸。全部农业生产——这是俄国最主要的生产——都被1861年的赎买办法弄得混乱不堪;大地主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农民没有足够的土地,他们遭到捐税的压榨,受到高利贷者的洗劫;农产品一年比一年减少。所有这一切只是靠亚洲专制制度在表面上勉强支持着,这种专制制度的专横,我们在西方甚至是无法想像的。这种专制制度不但日益同各个开明阶级的见解,特别是同迅速发展首都资产阶级的见解发生愈来愈剧烈的矛盾,而且连它现在的体现者也不知所措了:今天向自由主义让步,明天又吓得要命地把这些让步收回,因而自己愈益严重地破坏对自己的一切信任。”^⑥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革命,是这些东方国家唯一的选择。

但是,怎样革?谁来革?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西欧历史的研究,并不能直接套用于东方。他们本人,也始终深刻地明了这一点。我们知道,早在1848年,早在西欧资本主义蓬勃兴起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对社会发展的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前途,作出了具体细致的科学预见。但是,对于东方革命,他们却保持着审慎的态度。他们一方面清楚地看到:“俄国无疑是处在革命的前夜。”^⑦“俄国社会的一切阶层目前在经济上、道德上和智力上都

①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3页。

② 参见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该书通过调查表明一些地区农产物出售部份平均达52.6%,生活资料购买部份平均达34.1%。马扎亚尔:《中国经济大纲》,新生命书局1933年版。作者通过部分地区的调查,认为农民经济的商品率不低于40%。

③ 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根据第263页表4。

④ 参见马扎亚尔:《中国经济大纲》,第38页。

⑤ 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页。

⑥ 恩格斯:《论俄国社会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22—623页。

⑦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22页。

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这一次，革命将从一向是反革命安然无恙的堡垒和后备军的东方开始。”^①一方面，除了（与把中国的革命看成是欧洲革命的信号^②一样）把俄国革命视为欧洲革命的信号外，却一直没有对革命的目的、性质、前途和领导阶级作过正面的描述。甚至已经到了这样的最后关头，革命“它每天都可能爆发。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就象一颗装上炸药的地雷，所差的就是点导火线了，……在这种情况下，很少几个人就能制造出一场革命来，换句话说，只需轻轻一撞就能使处于极不稳定的平衡状态（用普列汉诺夫的比喻来说）的整个制度倒塌，只要采取一个本身是无足轻重的行动，就能迸发出一种后来无法控制的爆炸力。”这时，恩格斯也只是说：“据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在俄国能有一种推动力，能爆发革命。至于这一派还是那一派发出信号，是在这面旗帜下还是在那面旗帜下发生，我认为都是无关紧要。”^③革命导师的这种谨慎态度，曾使死搬书本的教条主义者处于绝望状态。托洛茨基沮丧地说：“行会是中世纪文化（它也传播到乡村去）的基础。中世纪的科学、经院哲学、宗教改革都是从行会这块土壤上成长起来的。而我们不曾有过这些东西。当然，萌芽状态的征兆、迹象是可以找到的，但是在西方，这些东西并不是征兆，而是以行会为基础的强大的文化和经济根底。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而且它在这个基础上成长，开始同教会和封建贵族相冲突，并且通过君主政体之手来反对贵族们。这种城市建立了以火器装备常备军的技术条件……。我们的行会城市——即便是多少有点象西方的那种行会城市——在哪里呢？它同封建贵族的斗争又在哪里呢？……从我们的城市本身的性质来说，我们不曾有过这类斗争，正如我们不曾有过宗教改革一样。……我们的手工业还停留在家庭手工业的阶段——这就是说，还没有同农业相分离。我们的宗教改革还停留在农民教派的阶段，因为它在城市里找不到领导者。原始和落后在这里向苍天呼叫。”^④托洛茨基在这里所反映出的，正是一般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简单套用西欧历史模式的可怜相。显而易见，这种论调所能加予马克思的，决不是“过多的荣誉”，只能是“过多的侮辱”。

尽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能也不可能从头系统研究东方国家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但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多种道路，始终是他们的基本的思想方法；西欧资本主义不能替代东方各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在他们头脑里，始终是被他们称为“离奇悲剧”的历史事实所验证过的基本认识。这种认识，反映在他们关于俄国村社以及中国前途的一系列直觉判断和科学假设之中。他们曾分别多次指出：“俄国农村公社的情况同西方原始公社的情况完全不同”。俄国村社是“古代社会形态的最新类型”，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存在的，“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生成就”。“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命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⑤（着重号是我加的）“由此可见，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试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⑥马克思这段《资本论》与东方国家的某种生产方式的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75页。

② 马克思：“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通危机爆发，这个普通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1—302页。

④ 托洛茨基：《对波克罗夫斯基的答复》。转引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第10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14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66页。

途无关的论述，真是发人深省。基于这种认识，他曾神采飞扬地预言：“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①

俄国革命没有成为西欧革命的信号，经历了起义、平叛、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集体化这样一条特殊的道路。中国革命从“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们的城市暴动到“农村包围城市”，经历了一个更为曲折漫长的独特过程。尽管同样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尽管革命的最终目标同样都是实现共产主义，但是，他们都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所设想的那种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基础上爆发的革命；革命胜利之后，也没有经过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毫无疑问，这丝毫不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相反，革命的胜利证明，列宁、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摒弃托洛茨基、王明式的教条主义，坚持世界历史的“多线”发展，坚持不同国家不同的革命道路，恰恰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表现。

四、“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启示

启示一：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人类历史的发展是通过不同地区、民族或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实现的。但是，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要讲相互作用，就必须有作用的主体和客体，就必须以主客体之间的相异为前提。“亚细亚生产方式”提出的意义就在于承认这种有时甚至是巨大的相异性。传统的认识以为，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各种信息急剧膨胀，人类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频率和能量日趋加强、加快，这种相异性会越来越小，直致“天下大同”。逻辑常识告诉我们，相异性的消失，意味着相互作用的停止，人类进步的终结。近、现代世界历史的演进更在事实上否定了这种僵化的思想方法。随着人类进步节奏的加快，随着信息交往的极大丰富，供人类以及各不同民族活动、选择的可能性空间，也呈几何级数迅速扩大，从而把历史发展的多样化图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丰富、更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从资本主义兴起以来，在日趋频繁的相互作用中，无差异的欧洲“分裂”了，作为整体存在的东方“分裂”了，不毛之地非洲、美洲也“分裂”了。人们看到了意大利都市与汉撒同盟的不同，看到了英格兰与尼德兰的差异。英国的圈地运动，美国的份地法、法国的小农、德国的容克地主，这之间都在共性中蕴藏着个性，资本主义就在不同的个性中寻求历史前进的力量。西欧资本主义推广“斯密原则”的结果，却是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落后国家的崛起，苏联、中国、印度的革命，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日本、东南亚、南美诸国不同道路、不同模式的发展，更给古代单调的人类历史发展提供了广阔、丰富的前景。

在自然经济的宁静生活中，在无数“同名数”相加，像一袋马铃薯一样组成一个无差异的封闭均匀的社会里，“相异性”不过是人们在享受停滞的安谧之余，茶余饭后闲谈的新闻。而在现代“异质社会”中，交换、分工、竞争使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差异中生活。相异性成了人类生存的依据，一些运动的源泉！机械、宿命的历史决定论，被眼花缭乱的多样性、不确定性事件所突破。人类面对日臻广阔的选择可能性空间，面对日益复杂的相互作用，面对非西欧各国的丰富发展模式，不能不再次提起必然与偶然这一古老的哲学命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多线史观与单线史观旷日持久的争论，除去政治意义外，并不在于对不同民族历史发展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述评（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65页。

的相异性和统一性的肯定与否，实质上两种不同的历史观代表了两个不同时代的认识，他们都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正是由于相互作用步伐的加快，世界历史的多样化发展，已使任何回避相异性、回避不同民族有不同发展道路而空谈一般性、铁一般必然规律的学说丧失了存在的价值。——马克思作为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面对这个现实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启示二：历史是一个有因果联系的过程。不同地区或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互相影响甚至改变一些地区或民族历史发展的方向，但是这种影响和改变，决不是一种简单的替代关系。

从生产力水平看，我国曾和西欧多次处于一个相类似的水平。然而，由于一系列复杂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因素，我国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西欧的社会结构和独特的民族传统，直到今天还在发生着巨大的作用。鸦片战争的炮火，打断了中华民族封闭的沉睡。面对强大的国际资本主义，我们又经历了一场半殖民地的恶梦。照搬西方的努力，化成“离奇的悲剧题材”。事实证明，西欧的资本主义仅仅就是西欧的资本主义。马克思早就说过：“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①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使中国从悲剧中觉醒，我们革命了，胜利了，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一系列极其巨大的成就，在实践上说明了马克思这一论断的正确性。但是，出于对帝国主义残酷压榨的切肤之痛，囿于对世界历史发展一种铁的必然性的僵化理解，我们一些同志没能真正从历史的角度认识中国近代的悲剧，没有在认识上将资本主义的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一方面对任何与资本主义相类似的现象充满过份的恐惧，一方面，教条主义式地过多过急地追求马克思根据西欧历史发展线索对西欧式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具体描述，没有更明确地沿着我们独特的革命道路继续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对东方传统中的精华一概否定，而对糟粕部分一度丧失了应有的高度警惕。为此，我们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曲折反复。在十年动乱中，为这古老祖国的新生，我们民族再次付出了高昂巨大的代价。中国以及许多第三世界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透彻把握西欧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之后重新研究“亚细亚”问题的历史意义，说明了世界历史中的相互作用，既不意味着人为地照搬哪个国家的模式，也不意味着自然地重复任何民族（不管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的老路。中国近代史上的离奇悲剧为我们提出了一道二律背反式的难题：要振兴中华，我们既不能倒向西方而完全否认我国的国情和传统，又不能倒向传统而完全否定西方的进步因素。这就是我们所要走也只能走的特殊道路的本质规定。在这个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中，否定国情和传统，只能重演历史悲剧，否定西方文明的先进因素，只能恢复停滞不前。这两种倾向，都是使我们民族不能在现代世界生存发展的错误抉择。

启示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从整个人类历史运动的高度看，一般地说来，生产力的先进，同时意味着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形态的更高级。为此，马克思才有铁器产生奴隶社会、手推磨产生封建社会、蒸汽机产生资本主义社会的形象描述。但是，哲学上对人类社会的一般概括，并不能直接套用于民族经济不同发展的历史实践。古代史上，罗马帝国可谓盛矣，生产关系、社会形态可谓发达、先进，但是并没有那一位史学家断言，全世界各民族都必须发达到这个程度，人类才能继续前进。中国早在秦朝，就车同轨、书同文，修长城，开五岭，雄踞海内。汉代精兵强将，征匈奴，通西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20页。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①盛唐时期，开海运，降四夷，兴百工，修水利，海内殷实如唐人郑棨所记：“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数。四方丰稔，百姓殷畜。”（——《开天传信记》）贸易繁荣“天下如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味且永日。”^②我国古代人口众多，高度统一，有庞大的水利工程，发达的水陆交通，繁荣的内外贸易，成熟的科举制度，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管理系统。作为四大发明的祖国，我们古老的传统曾使西方人惊叹和欣羡不已。但是，也没有人认为，西欧黑暗的中世纪，应当用中国文明来代替。在不同民族的经济史上，生产力发达，并不等于生产关系及其社会形态就总是绝对地先进。历史运动不是公式的推演，它是无数“分力”作用的结果，包含有被哲学抽象所扬弃的一切偶然因素。历史渊源可以上溯到公元前六十世纪的古埃及，建筑了宏伟的金字塔，但是典型奴隶制却发展成熟在开化较晚的地中海北岸；中国没有经过古罗马的繁荣，但是她却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东方文明，西欧中世纪被教会的黑暗统治所笼罩，但恰恰是她而不是其他更发达的地方插响了城市崛起的战鼓。人类历史是在此起彼伏的交互作用下前进的。如果不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人类的终结，那么肯定还会有更优越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在人类交互作用的历史进程中诞生。根据以往的经验，很难说这更优越的社会一定诞生在欧洲。对于俄国村社，马克思曾肯定它有可能“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并且进一步指出：“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③（着重号是我加的）由此可见，传统的延续或对传统的利用，并非消极的权宜之计。我们不仅不应用西方的模式代替对我国国情的具体分析，绝对地排斥一切传统，相反，我们更应在改革、前进，与传统彻底决裂的过程中，挖掘传统中有利于今天民族复兴的积极因素，在与过去告别的现代世界中，走出一条我们自己的更有生命力的中国道路。既然马克思敢于假设俄国村社可能成为比西方资本主义更先进的因素，既然落后的蛮族入侵先进的罗马，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既不是氏族社会也不是典型奴隶制而是更先进的席卷欧洲大陆的农奴制度，既然近代历史的悲剧证明了先进的资本主义不能替代中华民族的文明，我们能不能在饱尝失败与挫折的痛苦而重新面临新的选择关头时，摒弃非此即彼的习惯方法，冲出用西欧历史和规范硬套我国实践的藩篱，在实践上和理论上走出一条既不是传统也不是西方但同时又包括传统和外国一切先进因素的新路呢？——党中央最近提出改革经济体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这个历史哲学问题再一次作出了肯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行动指南。掌握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了解他的结论、观点，更重要的是把握他的方法、世界观和历史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事物，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这也许是我们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时，应当得到的一点启示。平凡的真理，是最不易被人理解，同时也是最深刻、最有用的。

（本文是1981年的读书笔记，1982年4月整理。陶驊同志作了引文核对工作。）

① 《史记·平准书》。

② 《旧唐书·崔融传》。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1—441页。